

璀璨斑斓——江西出土玉器概述



彭明瀚 (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襟江带湖,气候温暖,雨量充沛,东北部、东部是怀玉山、武夷山,南部有大庾岭、九连山,西北部、西部有幕阜山脉,北靠长江,地势中间低,四周高,由南及北、由边及里徐徐倾斜,宛如一个开口朝北的大盆地。赣江自南向北纵贯全境,从盆地中部缓缓流过,源于东、南、西三面山地的大小河流 2400 多条,构成一个以鄱阳湖为中心,包括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流域的向心水系,汇入鄱阳湖,注入长江。山间盆地、山前台地、河谷阶地、河口冲积平原等处则是人工灌溉技术发明以前古人类生活的理想场所,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这些地区成为古代文化发达之地。

江西考古工作起步比较晚,始于饶惠元先生在清江县(现改名为樟树市)的考古调查。1947-1955年,他在清江县及其附近地区发现 47 处古文化遗址,其中大部分遗址后来证实属于吴城文化遗址,如筑卫城、营盘里等。新中国成立后,祖国的文化事业蒸蒸日上,科技进步,学术繁荣,江西的文物考古事业有了极大发展,考古资料层出不穷,重大发现时有涌现。

新石器时代玉器,在丰城^①、新余、德安、靖安、广丰社山头等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有零星出土,数量极少,品种单一,主要有琮、斧、钺和璜等,在造型和装饰方面带有明显的良渚文化玉器色彩。丰城市采集的一件多节式玉琮(彩版二,5),无论是造型,还是筒体兽面纹的构图,都与江苏寺墩、草鞋山等地良渚文化多节式玉琮毫无二致。

商代的江西,是吴城文化的中心分布区,有着发达的青铜文明,玉器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有樟树吴城遗址^②和新干大洋洲大墓^③。1989 年发现的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是至今中国南方地区发现的最大一座商代大墓,不仅墓中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造型奇,纹饰美,铸工精,为中国南方地区所仅见,而且其玉器群也是继安阳殷墟、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重大发现。大洋洲商墓出土玉器 754 件,可分为礼器、仪仗器、装饰品三大类。礼器 33 件,器类有琮(彩版二,2)、璧(彩版二,6)、环(彩版二,4)、璜、瑗、玦等;仪

仗器 7 件,器类有戈、矛、钺;其余均为装饰品,种类丰富,数量最多,主要用作佩带装饰物和插嵌于其它物品上作观赏品,器类主要有笄、镯、项链、腰带、串珠等。装饰品精品纷呈,其中有一部分造型生动,雕刻精湛,体现了商代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平,它象一面镜子,透露着南方青铜王国吴城文化发达的琢玉业信息,为追寻其玉器加工、产品特点等提供了丰富的标本,也为商代玉器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

大洋洲出土玉器的质料,大部分为透闪石,少量为磷铝锂石、叶腊石、绿松石、水晶等;玉器内部颜色为白、灰、浅黄褐等,器物表面则呈现出紫、褐、黑等色彩。器表呈现出丰富的色彩,与玉器对外来离子的吸附有关。这是由于大洋洲玉器质地疏松,多孔隙,有利于表面吸附和表面发生化学反应;玉器埋藏于潮湿偏酸性的土壤中长达数千年,一方面玉材中的活跃元素会溶失,另一方面土壤中的元素及有机物也吸附于器表;铜器与玉器一起埋藏使一些玉器表面形成鲜艳的绿色。总体上看,大洋洲玉器绝大多数器表受沁,呈所谓的“鸡骨白”(彩版二,7)。

大洋洲玉器群在文化性质上强烈地表现出双重性,即无论是从玉器的类型,抑或是造型、装饰纹样,乃至制作工艺都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与中原殷商文化的一致性,诸如璧、瑗、玦、琮、环、璜和戈、矛、钺以及装饰品中的柄形器、笄形器等,都与中原殷商时期同类玉器造型相近;玉器上的斜方格纹、菱形纹、回字纹、对角几何纹和臣字目的兽面纹等装饰纹样,也是中原二里头文化以来玉器上常见的纹样。中原殷商时期玉器纹饰的制作方法,特别盛行平行的双线雕,运用减地手法,即先阴刻双线,然后将阴线外侧的地子均匀地琢低一层,双线之间便浮出一道阳线,大洋洲玉器中同样有相当一批是采用这种方法制作的。

当然,大洋洲玉器群也有自身的一些特色,比如,在器物种类方面,礼器只有璧、琮、璜,中原地区常见的圭、璋、琥不见。在装饰纹样方面,高羽冠神人像,很有地方特色。大洋洲玉器群这种既具有商代古玉的普遍共性,又带有某些自身个性的双重特征,无疑

是商代南方地区一批典型的标准器，它为中国古玉的研究，特别是对传世古玉器的断代和鉴赏有着特殊的意义。

两周时期，江西历史文化进入低谷，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址，多为中小类型，没有像商时期吴城、牛头城那样的高等级遗址，因而这一时期的玉器只有零星出土，数量少，品种单调，只有玉璜、玉环、玉佩等，较为重要的有樟树观上春秋墓^①、樟树牛头山战国墓^②、贵溪龙虎山两周崖墓^③等地出土的玉玦（彩版二，3）、玉璜（彩版二，9）等。

汉代是中国古代玉器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无论是数量、器种，还是造型、琢制诸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器形出新，纹饰脱俗。西汉初年，在江西地区设立豫章郡，江西第一次作为一个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区登上了历史舞台。豫章设郡后，社会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人口急速增加。西汉代玉器重要的考古发现有南昌市东郊永河大队西汉墓群^④、老福山西汉木椁墓等^⑤，出土玉器种类丰富，有玉璧（彩版二，8）、玉佩、玉璜、玉剑首、玉珌等，造型、纹饰与中原地区同期同类器基本一致。南昌市东郊永河大队汉墓群13座墓中，有2座墓出土了玉璧、舞女玉人（彩版二，10）、玉璜（彩版二，11）、玉珌、象牙璧、象牙环等9件。

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是玉器的低潮，考古发现玉器极少，江西南昌市郊京山南朝墓出土带钩、璜、玦（彩版二，1）、佩、异兽（彩版三，2）等数件玉器^⑥，是此期玉器最为集中的一次考古发现，虽然特征不很明显，但与汉代玉器之间还是稍有差别，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玉器工艺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宋代的江西，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手工业兴旺，文化昌盛。宋代是玉器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经过三国时期到唐代漫长的低潮之后，玉器生产骤然繁荣，玉器种类繁多，佩玉大量出现，无论是玉器的品种，还是造型艺术、雕琢工艺都有了很大进步，尤其是圆雕玉兽，一改前代玉器以稳定的几何形体为主的造型风格，使玉雕的造型艺术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宋代玉器，史书上有较多的记载，但考古出土品很少。上饶市茶山寺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赵仲湮墓^⑦、吉水县金滩乡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张宣义墓^⑧出土的南宋玉器，为我们了解这一阶段玉器自唐代以来演变的规律、造型题材、制作工艺、风格特点等均提供了第一手实物资料。赵仲湮墓出土文物21件，玉带一套8件（彩版三，11）、银碗2件、铜器2

件，水晶环、水晶球、水晶珠、水晶狮（彩版三，1）、水晶饰品、料石狮、料石璧、墓志各1件，据出土墓志可知，赵仲湮系宋高宗叔祖，因而出土物较为丰富、较为精致。该墓出土玉带表明，宋代玉带与唐代、五代相比，已有较大变化：形制发生了变化，半圆形玉带板已不再见，新出现了桃形带板，方形、长方形、圭形玉带板的尺寸也变小了；所刻人物纹，既不是胡人形象，也不是唐人装束，而是穿方领大袖长袍的汉人形象，人物虽席地而坐，但座下已无地毯；雕琢技法也与唐代有区别，仅在主纹周围铲地斜磨，地子上稍见不平整现象，衣纹阴线比唐代细而短，显得拘谨，带板边框四周磨出很明显的斜面，可见四个直线棱，侧视为梯形，这种技法处理后纹饰突起，立体感增强；细部刻划上，线条流畅，不再用阴线勾勒，而是顺其自然，转折合理，不再施用那种装饰性的线条，衣褶线条刚劲柔和兼而有之，明暗折叠，随之而现，更加走向写实化，人物造型，生动逼真，已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境界，堪称宋代玉腰带中的珍品。这套带板，1块宅尾，7件长方形，数量与五代前蜀王建墓出土的带板相同^⑨，赵仲湮系明州观察使，因而这套带板是宋代高级官吏用玉制度的典型写照。这组玉器，造型规整，制作精工，出土于纪年墓中，有确切年代可考，成为鉴定南宋玉器的标准器。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恢复唐制，在冠服制度上也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规定玉是最高统治阶级的专用之物，明代玉器在宋代玉器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努力，将玉器生产推向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成为我国琢玉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之一。明代玉器制造的成就与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玉器种类增加，杯、碗、盘、文具等大量出现；第二，佩玉体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实用与装饰功能兼备的纽扣、发簪、佩坠，一改形式古拙之风，日趋世俗化，形式花样与日常生活越来越接近。还出现了一些制造极其简单的小件佩饰；第三，装饰纹样，一改前期程式化的风格，显得千姿百态，极富变化。

明代江西的社会经济，在宋、元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进步，市镇发达，手工业全面繁荣，商品贸易空前活跃。江西各地出土玉器的明墓在100座以上，尤以宁王、益王家族所在的南昌、南城两地最为集中，主要有：南昌市新建县华东交通大学院内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宁靖王朱奠培夫人吴氏墓^⑩，出土玉圭1件，玉佩一副，玉片、玉珠数千件；南城县红湖公社外源村明嘉靖十九年（1538年）益端王朱祐棨夫妇合葬墓^⑪，出土玉圭、玉带等26件（组）；南城县洪

门公社长塘村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益庄王朱厚焯夫妇合葬墓^⑤,出土玉圭、玉佩、玉带等1500多件;南城岳口公社游家港大队女冠山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益宣王朱翊钊夫妇合葬墓^⑥,出土玉圭、玉佩、玉带等289件(组),玉珠千余颗。

南昌宁王、南城益王家族墓出土玉器,有礼仪用玉圭、玉璧,实用佩玉、腰带、带钩、头饰、服饰、坠饰等,以玉圭、玉腰带及各种玉佩最为常见,一般是每棺出玉圭、玉腰带、玉组佩(彩版三,7)各1件(套)。玉佩饰种类丰富,有玉人(彩版三,5)、玉羊(彩版三,3)、玉鱼、玉鸟、玉花、玉牌子(彩版三,4)等,以益宣王墓出土的成串玉佩饰最具特色。这些玉器,时代从明中期至末期,为研究明王朝中央和地方制玉的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玉圭、玉璧等玉礼器,在明代,只有皇帝及皇室其它成员才能享用。《明史·舆服志》记,洪武二十六年更定,衮冕十二章,……圭长一尺二寸。”永乐三年定,玉圭长一尺二寸,剡其上,刻山四,以象四镇之山,盖周镇圭制,异于大圭不琢者也。以黄绮约其下,别以囊,韬之金龙纹。”嘉靖八年……乃定制……玉圭视镇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讨罪安民’。”皇后冠服,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琢谷文。”后太子妃冠服……其玉圭、带绶、玉佩俱同王皇妃。”亲王冠服,洪武二十六年定……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亲王世子冠服,永乐三年更定。玉圭长九寸。”南昌、南城等地的明藩王墓多数出土玉圭,总数在20件以上,基本形制是剡上方下,呈长条形片状,顶端凸起尖角,下端方正,边线平直,双面刻5行凸起的谷纹,长度在15厘米左右(彩版三,9),约合明代的五寸,是明代最小的一种玉圭。平民墓中未见玉圭出土,考古发现表明,明代皇帝及皇室其它成员对玉圭的专用制度得到了较好的执行。

江西明墓中出土了30多套玉带,较好地体现了当时玉带的制作工艺成就。明代早、中期的玉带板多光素无纹,如端王墓出土玉带板,羊脂玉质,光泽较亮,素面无纹。明代中后期的玉腰带多数为20块一套,排列形式按规定分为前后两排,前排13块,排列顺序为:长方形1块居中,两侧对称排列长条形1块、桃形3块、长条形1块、圭形1块;后排为大小相等或大致相等的长方形玉块7块,称七排方。益宣王墓出土的花形玉腰带(彩版三,10),中心为瓜形,四周雕花瓣的花形带,是明代玉带板的又一风格。益宣王墓和新建乌溪乡第三村明墓出土的2套玉带板,各有2块提携,类似的形制见于明初南京汪兴祖墓

出土的玉带^⑦,因而它们既有可能是江西地区特有的玉带形制,也有可能是明初旧玉。明代后期玉带板则多施有纹饰,纹样很丰富,有龙纹、凤纹、麒麟纹、花卉纹,常以龙纹、凤纹、麒麟纹作主纹,以缠枝花卉作底纹,再衬以如意、云纹、古钱、松石和卐纹等吉祥用意的图案,烘托主纹,充满活力,装饰化倾向更为突出,藩王玉腰带多数饰三爪或四爪的蟒;琢制工艺有粗细之分,粗工者奔放不羁,细工者精巧别致,还出现二层、三层甚至多层镂雕,玲珑剔透,有的还在纹饰内描金,极尽装饰之能事,如益宣王继妃孙氏墓所出玉带板,饰浅浮雕牡丹花,花纹阴线内描金,显得富丽堂皇。

宋代以来,贵溪龙虎山天师府是历代天师的府第,世代相传,一直沿续,因而,这一地区的天师墓中时有作为冥器的天师玉印出土(彩版三,8),制作或精细,或粗率,成为江西明清玉器的又一地方特色。

清代出土玉器,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九江县清道光年间的李鸿滨墓,出土玛瑙朝珠、玛瑙佛珠、翡翠扳指、翡翠鹅形佩(彩版三,6)、水晶眼镜等10件玉器,材质优良,琢制精细,为我们鉴定传世晚清玉器确立了时代标尺。

综上所述,江西古代玉器工艺美术,历史悠久,成就卓著。历代玉器,出土很多,出土玉器的墓葬,往往伴出陶瓷器,而陶瓷器的研究,在江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年代序列,可以作为判定墓葬年代的依据;加之宋代以来,墓葬往往有墓志、买地券、冥途路引等标明埋葬时间的纪年材料,给出了墓葬的确切下葬时间。因此,江西出土古代玉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江西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对于传世玉器研究来说,具有较好的参照作用。

注释:

① 万德强:《丰城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江西文物》1989年第2期。

② 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③ a.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第10期。

b.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c.彭适凡:《新干古玉》,台湾典藏杂志社,2003年。

④ 樟树市博物馆:《樟树观上春秋墓》,《南方文物》1997年第2期。

(下转第62页)